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国学新锐丛书

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研究

刘新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研究

刘新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研究 / 刘新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161 - 8002 - 0

I. ①唐… II. ①刘… III. ①江西省—地方史—研究—唐宋时期
IV. ①K29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478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国学院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资助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地理学丛书甲种第貳号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江南西道自然地理环境概述	(17)
第一节 东部亚区的山川水系	(17)
第二节 西部亚区的山川水系	(21)
第三节 南界五岭与北界长江	(23)
第四节 气候、降水及土壤等	(26)
第二章 江南西道政区的变迁	(28)
第一节 “山川形便”与“关河近便”——贞观十道	(28)
第二节 开元江南西道	(31)
第三节 从“江南西道”到“江南西路”	(35)
第四节 对唐“江南西道”的再思考	(38)
第五节 宋代江南西道的军	(41)
第三章 江南西道城市的发展	(48)
第一节 唐代江南西道新增县邑考述	(55)
第二节 五代至宋新增县邑考述	(64)
第三节 唐宋县邑增置的原因	(77)
第四节 旧城拓展的个案分析	(79)
第四章 江南西道交通格局的演变	(90)
第一节 “五岭”考	(92)

第二节	湘、赣水流域交通地位的演变——过岭交通述论	(105)
第三节	江南西道内部主要交通路线	(133)
第五章	江南西道的内部亚区	(139)
第一节	湖南:南通岭峽,唇齿荆雍	(141)
第二节	江西:襟江带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145)
第三节	鄂、岳:湖湘之要地、吴蜀之腰膂	(149)
第四节	宣、歙:地控荆吴	(158)
第五节	朗(鼎)、澧:控制蛮獠、捍御荆楚	(167)
结语		(180)
参考文献		(189)
后记		(203)

绪 论

一 区域选择与研究选题

本书研究的唐宋时期的“江南西道”，以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的江南西道辖境为准（见图1）。唐开元二十九年江南西道的地域范围，约当今江西省全境，湖南省雪峰山以东地区，湖北省东南部的鄂州、黄石、咸宁全境及武汉市的部分地区，安徽省的宣城、池州、铜陵及马鞍山市境以及江苏省南京市的部分地区^①。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视实际研究需要偶有盈缩，特别是本属开元江南东道的歙州（治今安徽歙县）与江南西道的宣州（治今安徽宣城市）于唐初的“贞观十道”中同属江南道，于自然、经济、人文等方面颇多相似之处，关系极为密切。安史之乱以后，唐廷设宣歙观察使，至唐末，宣、歙往往并提，故本书对宣、歙二州一并进行分析。除特指外，本书“江南西道”即指上述地域范围。

这里首先要对本书所采用的“行政区划”这一概念进行交代。行政区划，即政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行政区划是指国家划定的正式的行政管理区域，如先秦已经产生的郡、县及汉末以后的州，元明清的省等；广义的则指一切具有行政管理区域职能的区域。其中有些区域本来或为临时性质，或为局部范围内施行的制度，或为其他职能性质的区域，但在实际运作中又兼有部分或全部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些区域包括监察区域、军事管制区、财政督理区等^②。

众所周知，无论是唐代的道制还是宋代的路制，绝非严格意义上的行

^① 本书所用今日行政区划，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底为准，详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1）》，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33页。

政区划，特别是两个王朝前期，仅仅是承担某种或某些特定行政职能的区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中后期开始具备行政区划的特征。典型如唐代的道，安史之乱以后逐渐形成了道（方镇）、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层级，然则这一演变轨迹本身便是地域不断发展的体现，故本书借用“辖境”这一行政区划术语，后文还有详论，特此说明。^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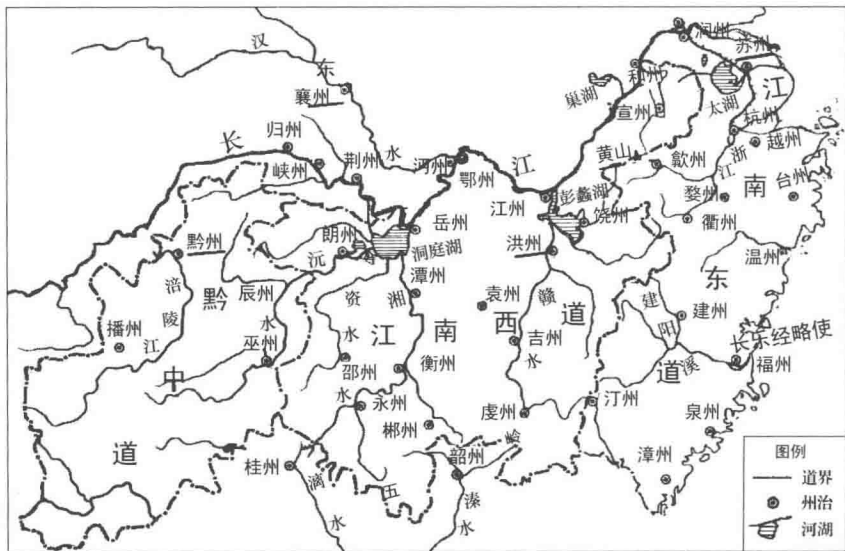


图1 唐开元江南三道示意图（开元二十九年，741）

开元末年的江南西道，实际上是监察道；宋代的路制，则一般理解为转运使或安抚使路，两者同属广义的行政区划范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唐代的道制，还是宋代的路制，到了后来都越来越具备狭义行政区划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人的言论中，已将道、路视作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了，如：“唐贞观十三年（639），天下州府三百五十八，始分为十道。一云在元年（627），并省州县，始因关河近便分置也。《唐会要》云，贞观元年三月十日也。开元中又为十五道。宋朝曰‘路’，又分为二十四路矣。”^② 监察道与转运使路并称，是宋人的一种思维定式。以

^① 江南西道，当时也被称为“江西道”，后文若非特别说明，江南西道或江西道即指开元二十九年的江南西道，与“唐宋江南西道”一词互用。

^②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州郡方輿部第三十五·路》，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356页。

“道”或“路”来按区域划分全国的州县，甚至直接将其作为高层政区，已是唐宋人的习惯做法，本书依照这个原则，把“道”和“路”看作高层政区，展开对唐宋“江南西道”发展的讨论。

由唐至宋，“江南西道”行政区划的剧烈演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唐贞观元年（627），因关河近便，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见图2）。其范围，“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①，地域范围过大。至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原江南道一分为三：东部为江南东道，西部置黔中道，中部地区为江南西道，是为开元江南西道。至德（756—758）以后，为应付安史之乱，唐廷将全国划为四十多个方镇。其中，江南西道主要拆分成宣歙^②、江西、湖南及鄂岳四个观察使辖区（见图3）。宣歙观察使辖区约当今皖南地区；江西观察使辖区则与今天江西省境基本一致；湖南观察使辖区相当于今湖南中南部地区，与湘、资二水流域基本一致；鄂岳观察使辖区约当今鄂东南及湘东北的岳阳等地；西北一隅的朗、澧二州则北属荆南节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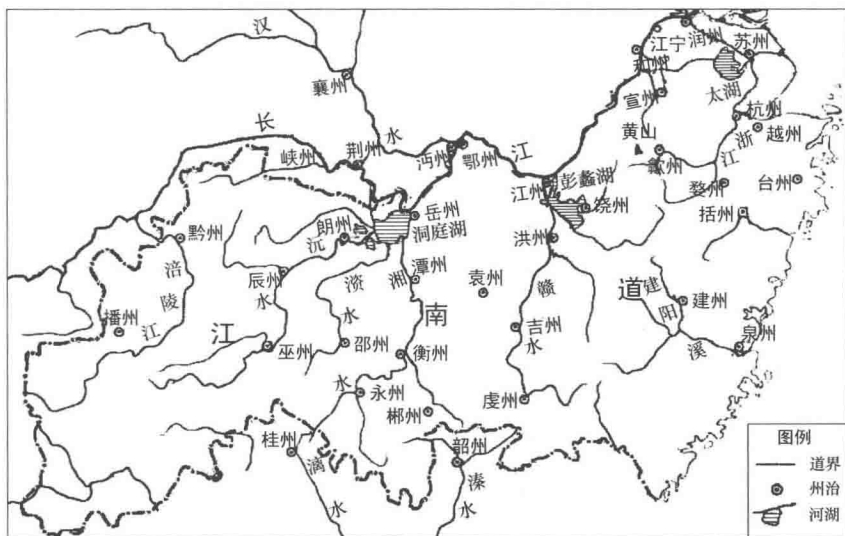


图2 唐初江南道示意图（总章二年，669）

①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条，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70页。

② 据（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及《旧唐书·地理志》，开元江南西道不包括歙州，《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所记相反，当以前者为是。如本书开篇所言，宣、歙两州本身相似之处甚多，后又合为一个观察使辖区，故放在一起讨论，详见第五章论述。

安史之乱以后，“天下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①，道逐渐成为凌驾于州以上的高层政区。随着唐中央集权的衰落，地方分裂倾向日趋明显，大的节度使纷纷僭号，终于导致唐王朝的灭亡和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形成。江西观察使辖区演变为十国中吴和南唐的疆土，而湖南道观察使辖区则成为马楚的前身。



图3 唐元和江南方镇示意图（元和十五年，820）

宋代广泛推行路制，但太宗至道三年（997）以前，“以转运使领诸路事，其分合未有定制”。至道三年，方正式分天下为十五路。唐江西观察使辖区与江南的东部地区整合为江南路，湖南观察使则变成荆湖南路（见图4）。真宗天禧四年（1020）四月，又“分江南转运使为东、西路”^②。此后，除南宋建炎四年（1130），江南东、西路再度合一，至绍兴元年（1131）复分为二（路以）外，终宋一代，除统县政区偶有调整，

①（宋）洪迈：《唐观察使》，《容斋三笔》卷七，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第509页。

②《宋史》卷八《真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68页。

江南路一直分为东、西二路。而荆湖南路，自荆湖路分南北后，终宋一代始终没有合为一路。鄂、岳二州与朗（鼎）、澧二州则大部分时间隶属荆湖北路；宣、歙二州则一直隶属江南东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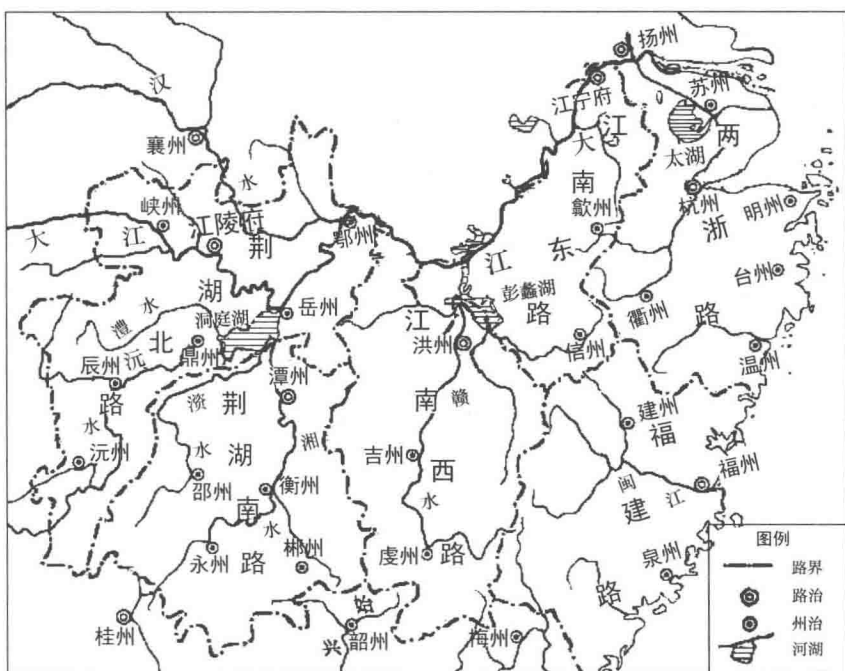


图4 北宋江南诸路示意图（政和元年，1111）

在唐以前的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中，“江南西道”一直没有整合为一体，即像江南西道这样整合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记录。王朝势力一般对其分而治之，汉、晋乃至三国的吴，对该地区的划分，几乎都是以中间的罗霄、武功、万洋等山脉为界，将江南西道西部亚区划归荆州，东部亚区则划属扬州。降至李唐，江南道将这两个区域首次捏合在一起。而且，开元江南西道的辖境远远大于江南东道。此后，由幅员过广的江南道到江南西道，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承平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江南西道一分为四，始有后世湘、赣二省雏形。其后历五代十国，到北宋的江南东、西二路，再经元明的湖广行省和江西行省，至清，湘、赣二省最终确立。

由此可见，唐开元末的“江南西道”的划分可谓空前绝后，唐代是

今江西和湖南地域分化与整合史上的关键阶段，宋代则是这种新分化的发展及初步定型的时期。宋代的“路”制表面上看是对李唐“道”制的一个扬弃，实则体现了继承与发展。并且，以“贞观十道”为代表的唐“道”的地域划分，后世尤其是五代及宋，依旧盛行。^①然则以“道”的地理范围讨论该地域在唐宋时期的演变，能够更好地把握其内在动因与影响。本书不拘泥于一朝一代，以唐、五代、宋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时段，首先将江南西道在唐宋时期政区分化演变的过程描述出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线索。

其次，江南西道行政区划剧烈调整的背后，又与这一区域内交通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江南西道内部有湘水及赣水两条南北贯通、逾越五岭的交通大动脉。秦汉时期，湘江水道的地位要比赣江水道的地位重要得多。六朝时期，赣江水道的地位开始上升。随着隋代开通大运河，唐代赣江水道的地位开始超过湘江水道，宋代赣江水道的这种交通重心地位则得到进一步确立，奠定了宋以后过岭交通的格局。本研究除对唐宋时期该地区交通路线进行整理之外，对于这两条南北大动脉地位的变迁，展开深入的讨论，以期反映出唐宋湘、赣地域发展的特点。另外，对于交通路线所涉及的“五岭”进行了考证，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

最后，江南西道的发展，在城市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唐宋时期该地区县邑的增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反映了该地区开发的深入，经济实力的增强。比较而言，江南西道内部东部亚区县邑增置的数量要比西部亚区多一些，除了反映出该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水平较高外，还能体现出帝国交通重心地位的确立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城市面貌的变化，特别是城墙的扩筑，也是唐宋时期该地区发展的一个表征，较大的城

①（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〇《选事》：“后唐同光二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吏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甲库格式、流外铨等司公事，并系《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等格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333—334页）；（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景德重修十道图》：“淳化四年，分天下为十道。景德四年八月己酉，命知制造孙仪、龙图阁待制戚纶重修十道图。祥符六年十月戊子，判吏部真从吉言，格式司用《十道图》，考郡县上下紧望，以定俸给法，官亦以定刑，而户口岁有登耗，请校定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影印本，第272页下栏）。宋淳化四年（993）一度分天下为十道，又《十道图》本为唐修，不仅有十道域分之图，且包含大量铨选、定赋、土贡等方面的文字材料，应该是类似图经一类的总志书，不管怎样，《十道图》以“道”为纲并为五代及宋沿用是没有问题的，后文还有论及。

市如南昌、长沙等都有扩城的记录。

交通、城市及经济的发展,对唐宋江南西道地域政区的调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交通路线的便利与否,城市的位置等因素,必然影响到政府对州县的析置、改属甚至废弃等举措的制定与实施。而唐宋江南西道地域的发展,又以交通、城市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本书以唐宋时期湘赣地域发展与政区演变为研究中心,除了对唐、五代及两宋江南西道的政区演变进行梳理外,还要从城市及交通两方面的变化来展开讨论,并试图分析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把唐宋江南西道地域当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又有自然地理上的依据。在中国地势图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以南,有两块都是中间低,东、西、南三面高,总体呈“U”形、较为完整的自然区域。这两块区域与今日湖南、江西两省政区基本吻合,而将这两个U形区整合起来,又会呈现出一个“W”形,基本与本书所要研究的地域范围,即唐开元末年的江南西道相对应。以自然地势论,江南西道三面阻山,西界武陵,东临武夷,南面更是东西横亘近千公里的南岭山区^①,大江是江南西道的北界。江、山相合,在这个“W”上又加了一道横线,从而形成一个近乎密闭的区域。这个区域中部以幕阜、九岭、罗霄等山脉为界,又可分成东、西两个近似的亚区。区域内的水系,西部亚区主要以湘江流域为中心,辅以资江、沅江、澧水等流域组成;东部亚区则以赣江流域为中心,辅以抚河、信江、修水以及饶河等流域组成。唐宋时期江南西道(路)的发展及其在后世的演变,如安史之乱以后的四个观察使区及宋代的江南西、荆湖南路,乃至发展至今日的湘、赣两省,其间种种发展变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区域内展开的。

综上所述,选择唐开元末年江南西道的辖境作为研究区域,体现了五个方面的有机结合:①唐宋江南西道地域相对完整的“W”状自然地势;②以唐、五代及宋为时段,注意到了江南西道区域分化与整合的过程;③无论是对整合的江南西道,还是对其以后地域分化的分析,都能够在一个完整的区域背景下探讨其整合与分化的规律;④江南西道地域在唐宋时期

^① 现代地理学中“南岭”东西长约600公里,南北宽约200公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若要讨论历史时期的“五岭”,则要将今天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山区考虑在内,则南岭东西绵延近千公里,详本书第四章第一节考证。

的发展变化,孕育了后世湘、赣二省的雏形;⑤湘、赣二省今日发展的诸种差异,甚至都可以从唐宋时期该地域发展的轨迹中找到根源。

二 过往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开元末“江南西道”的研究,属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区域历史地理学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产生了大量成果。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对区域历史地理学科本身的探讨也受到了重视,首先综述一下这方面的成果。

(一) 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讨

对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国外学者关注的较早。如美国学者普林斯顿·詹姆斯认为,在具体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区域是一个按一定的指标划定的可供思考的空间实体^①。苏联地理学家 B. C. 热库林则说:“区域的完整性提供了将所获得的结论与其他时期的资料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的许多奠基性著作由于研究区域的不一致,就难于和地理学对象的现代研究作比较。……因此,应当建议研究地理学对象发展全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家从工作一开始就确定研究区域的界线。”^②美国学者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着重从美国某些不同的地区,来揭示其地理的前后变化^③。

国内老一辈学者,如谭其骧、黄盛璋等先生,虽没有专门的论著对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进行阐述,但他们在著作中适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谭其骧先生认为:“以中国疆域之辽阔,要想一动手就写好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④谭先生阐述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必

① [美] 普林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423 页。

② [苏联] B. C. 热库林:《历史地理学:对象与方法》,韩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0 页。

③ [美] 拉尔夫·亨·布朗:《美国历史地理》,秦士勉译,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

④ 谭其骧:《东北历史地理·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 页。

要性，意在最终建立系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观点对于进行某一时期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1964年，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提出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新四分法：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区域地理和历史地图学。他对历史区域地理学的界定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从地区上各种现象的分布开始，而最后必须综合到地区之上，所以除了部门的研究外，还必须有区域的综合研究，这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学。”^① 前辈学者的这些观点和见解，为后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指导。

在近些年研究成果中，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及《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② 两篇论文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回顾了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划分与设定的原则，并对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区域多样性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综合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界对研究“区域”的设定与划分的依据，鲁西奇将其归纳为四种情况：一是先秦时期（主要是战国时）诸侯国的疆域；二是行政区（包括以某一历史阶段的行政区或现行行政区作为研究区域划分的标准）；三是民族聚居区域；四是某些特殊的地理景观特征（如黄土地貌、盐产区、黄泛区以及各种农业经济形态）^③。对于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划选择的依据，鲁西奇提出了四个原则：第一，以自然地理区划作为基本构架；第二，注意研究区域的历史连续性；第三，保持区域的完整性；第四，考虑区域的现实性问题。“我们将以上四点分别称为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划分的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与现实性原则，如何将这四个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划分的关键所在。”^④ 专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是他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路与方

① 黄盛璋：《论历史地理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地理集刊》第七号，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17页。

② 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81—86页；《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222—228页。

③ 详参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83—84页。

④ 同上书，第85页。

法运用到个案研究的集中体现^①。

（二）有关唐宋时期政区沿革的研究成果

史念海先生的《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②，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唐代十道与十五道的划分、道与军事的关系及道内户口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对于江南西道，史先生认为该道从江南道析置出来，基本与唐初划分十道时一样，大体仍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唐代，江南西道的与江南东道的经济都是相当良好的，唯有黔中道较差。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③一文对唐代十道的析置进行了详细考证，他认为开元年间并不是十五道，应是十六道，而且江南西道的分置，亦不在一般志书上记载的开元二十一年（733），而是在与山南道分东、西的同一年，即景云二年（711）。郭峰《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④一文则主要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分两个阶段分析了唐代道制改革过程，探讨了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体制形成的积极与消极意义。张家驹《宋代分路考》^⑤、王文楚《北宋诸路转运司的治所》及李昌宪《宋代诸路的辖区与治所沿革研究》《宋代的军、知军、军使》等，分别对宋代诸路的沿革，北宋转运司路的治所，诸路辖区与治所的沿革，宋代军、知军、军使及其关系进行了考证。

（三）有关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的研究成果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江南西道进行过系统研究的，主要有以下三部

①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相关论著还可以参考朱圣钟《简论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唐都学刊》2003年第3期，第87—89页；李治安《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10—11页；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② 史念海：《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页。

③ 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史语所集刊》第三十六本，1964年，又收录于《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193—200页。

④ 郭峰：《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95—108页。

⑤ 张家驹：《宋代分路考》，《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4卷第1期，第25—44页。